

■ 赵志立

编辑学 基本原理

编
辑
学
基
本
原
理

四川大学出版社

编辑学基本原理

赵志立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年·成都

(川) 新登字 014 号

责任编辑: 陈建明

封面设计: 李显陵

编辑学基本原理

赵志立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望江路 29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地矿局测绘队印刷厂印刷

850×1168mm 32 开本

7 印张 2 插页 173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5614-1111-1/G·197

定价: 5.60 元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赵志立，籍贯四川万县市，届“不惑之年”。大巴山区插过队，西藏边防扛过枪，当过10年记者、编辑，曾有数十万字的新闻、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1983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新闻干部专修科，1988年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攻读新闻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近年来，致力于新闻学、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已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学术论文10余篇，为研究生讲授《编辑学基础理论》、《新闻学概论》、《报纸编辑学》等课程。本书为作者撰写的第一部学术专著。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一 关于编辑的定义	(1)
二 关于编辑“有学”、“无学”	(7)
三 编辑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12)
四 编辑学研究的方法	(17)
第二章 编辑主体论	(21)
一 编辑主体与客体	(21)
二 编辑主体的意识	(27)
三 编辑主体的思维方式	(42)
四 编辑主体的创造性	(51)
第三章 编辑传播论	(61)
一 编辑与传播的关系及历史演变	(61)
二 编辑在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70)
三 编辑在传播中的信息控制	(81)
四 编辑与传播场	(92)

第四章 编辑社会论	(97)
一 编辑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关系	(97)
二 编辑的社会功能	(107)
三 编辑的社会角色	(117)
四 编辑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128)
第五章 编辑文化论	(140)
一 编辑与文化的关系	(140)
二 编辑的文化特征	(147)
三 编辑的文化功能	(158)
四 编辑与文化建构	(168)
第六章 编辑人才论	(173)
一 编辑人才的素质	(173)
二 编辑人才的培养	(185)
三 编辑人才的管理	(195)
四 关于编辑“学者化”的思考	(207)
附 录:试论编辑对文化毒品的社会控制作用	(210)
后 记	(220)

第一章 绪 论

一 关于编辑的定义

什么是编辑?换句话说,“编辑”这一概念的基本含义是什么?这是编辑学研究中遇到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也是编辑学理论大厦建构中一个最引人注目且争议最大的问题。“编辑”之于编辑学,已不是对一个简单概念的界定,而关系到编辑学研究的对象、学科性质的确定和学科体系的建构,牵动着学科建设的全局。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理论、任何学科的建立都必须从弄清楚一些基本概念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价值学说,不也正是从剖析“商品”这一细胞开始,进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吗?研究编辑学必须首先从研究“编辑”开始。

关于“编辑”一词,从词义上讲,国内外所出版的辞书作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在英语中,“编辑”可用两个相关的词表示:“edit”、“editor”,前者是指编辑工作或编辑行为,后者是指从事编辑业务的人。而在汉语中,对“编辑”一词的释义也包含两层意思——(1)指新闻出版机构从事组织、审读、编选、加工整理稿件等工作,是定稿付印前的主要环节。(2)指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辞海》1979年版)。在汉语里,“编辑”一词因一符多义,运用时若没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常常很容易把编辑活动与编辑者混为一谈。其实,编辑活动与编辑者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把编辑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它所涵盖的范围要广得多,内涵要丰富得多;而把编辑作为一种职业,它的内涵和外延就大大地受到局限了。有的学者在讨论“编辑”的概念时仅把“编辑”一

词作为一种职业来理解，认为编辑学的建立要以编辑职业的独立存在为起点，对这一职业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规律进行专门研究，并形成一门学问。这样，把编辑学的研究一开始就限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讨论“编辑”这一概念必须以研究编辑活动为出发点，在揭示编辑这一社会现象的基础上反映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和本质特征。这是把“编辑”仅作为一种职业的称谓所不能包涵的。

从古代编辑史的角度去考察编辑的含义。在古汉语中，“编”的原意是用以穿联竹简的牛皮绳。如成语“韦编三绝”，说的是孔子晚年很爱读《周易》，翻来复去地读，竟使编联《周易》的皮绳断了好几次。后来词义出现了引申和发展，有了组织排列的意思。如《史记·孔子世家》：“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编次，便是按次序编排的意思，反映了编辑工作的最原始、最基本的含义。“辑”的原意是协调驾车的众马，如《列子·汤问》：“推于御也，齐辑乎辔衔之际。”后来词义也有了新的转化，有了聚集的意思，《汉书·艺文志》：“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里的辑字，就含有将文字资料加以收集的意思。“编辑”作为双音节词在唐代才被使用。《南史·刘苞传》：“（刘苞）少好学，能属文，家有旧书，手自编辑，筐筐盈满。”又如《唐大诏令集》：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唐高宗年号）《颁行新令制》称：“然以万机事广，恐听览之或遗；四海务殷，虑编辑之多缺。”这里的编辑已有文字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的意思了。《辞源》对编辑一词作了这样的定义：“收集资料，整理成书。”这个定义虽然过于简单，但它还是概括了编辑工作最基本的含义。

围绕着编辑工作的基本含义，编辑学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的区别。有的学者认为，在古代编辑与编纂是不分的，编辑既包含有收集和整理的意思，又有纂写、著述的意思，因此把编辑与编纂两个不同的概念混在一

起。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去分析。编辑活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水平都必然受社会环境诸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决定和制约。在古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传播工具的落后，以传播为目的的编辑事业并没有一开始就形成，也没有产生专司“收集资料，整理成书”的职业编辑。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往往既是作者，又是编辑，又是校对，编辑劳动并没有也不可能同其它精神劳动严格地区分。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编辑家大多数是集编辑、著述、校对为一身的。例如孔子编《六经》，主要是利用已有的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审选、删订，正如清代学者章学诚所言：“六经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校通义》卷一）这种对古代文献所作的整理工作，理所当然地应归为编辑工作的范畴。但是，孔子在搜集整理文献的过程中，远非只是对旧有材料进行的“编次”，而对其中许多内容进行了“笔削”，直抒其思想、感情、观念，“微言大义”，这些显然具有著述的性质。再如司马迁编《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根据自己博采广闻的素材，经过精心剪裁提炼，于叙事之中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无疑是一种著述活动。但是，司马迁在编著《史记》的过程中，既进行了大量的写作，也对许多史料进行了整理和加工，并创造了纪传体史籍的编写体例，留下了一部“上起轩辕，下至于兹”，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的“百科”全书，这就确立了他在编辑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种“编著合一”的现象的确延续了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直到唐宋时期，随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提高，编辑出版活动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以对他人的作品进行选择、加工、整理为主要特征的职业编辑开始出现，编辑活动终于演变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业，编辑活动才逐渐与

著述活动分开。由此可见,“编辑”这个概念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概念。林穗芳先生在分析编辑活动的历史演变的基础上指出:历史上存在着“作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与“作为出版工作一部分”的编辑这两种不同的编辑。^①林先生对以编辑命名的两种活动作出了科学的区分。也正是这两种编辑活动反映了编辑的内涵和外延演变的历史过程。我们在编辑学研究中不能割裂这个历史,或者把历史上出现过“编辑合一”的现象看待今天的编辑活动,把编辑概念的内涵加以扩大;或者以为编辑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现代编辑,并由此而推论孔子、司马迁不是编辑家,编辑史应该从有了出版工作后写起。

从古代到现代,随着编辑活动的发展和衍变,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很大变化。目前我们能看到的的大多数关于编辑的定义,都是针对现代编辑活动而言。

《现代汉语词典》:编辑是“对资料或现成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

《新闻学简明词典》:编辑指“报刊、图书出版过程中,有关组织、审读、编选、加工稿件以及制作标题、设计版面等专业性工作。”

《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编辑通常是指编辑工作而言。它是对人类的社会精神产品(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声像制品等)的原稿进行选择加工,使之广为传播的工作。”

美国《出版词典》:“编辑工作(1)对稿本或其他记录材料进行改动或提议改动。例如:著者可以在作品上更改,编辑则可对作品进行审评,对准备出版的稿件进行内容及文字加工或技术加工,文字编辑加工即将排版或即将输入计算机储存库的稿本,电

① 林穗芳:《“编辑”和“著作”概念及有关问题》,见《编辑学刊》1994年第1期。

影、电视制作者则编辑用以制片的电影电视材料。(2)从广义上讲,是为出版进行写作或组织稿本,取得出版权,并使其通过整个出版过程。”

日本《出版事典》:“一般指以公开发表为目的,收集作品及其他资料,按一定方针进行整理编排,以符合某一特定传播媒介的需要,因而电影的编辑和广播电视节目的编辑也都包括在内。狭义地说,可定义为:按照在一定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制订的编辑计划,以作品原稿为工作对象,进行创造性的整理编排,使之形成出版物的形态,这种具有学识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称为编辑。”

以上定义极大地丰富了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第一,明确了编辑活动是一种社会活动。历史上编辑“收集资料、整理成书”的含义,基本上是一种个人行为,是“作为著作方式一种”的编辑,虽然其中也有大量根据官方档案文献或宫廷藏书,进行搜集、校理、注释、编序等编辑工作,但大多是为自己的著作服务的。而现代的编辑活动,则更多仍是根据社会文化建设和社会成员精神消费的需要,按照一定的编辑方针,对他人的作品进行整理加工和组织作者进行新的写作。这就突出了编辑在社会精神文化生产中的组织作用。第二,明确了编辑活动是以传播为目的。在古代,由于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的落后,书籍只能是在简帛、纸张上手抄而成,不可能大量的复制出版,这就大大限制了书籍的传播。再者,古人编书,虽然客观上也有向社会传播的功能,但并不主要以传播为目的。书籍深藏于宫中秘阁,或流传于文人学士,只供极少数人阅读。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传播工具的出现,为大范围的社会传播创造了条件,编辑生产的精神产品不是为少数几个人服务,而是通过大量复制为包括读者、观众、听众在内的广大受众服务,编辑活动也成为为了传播所作的种种前期准备工作。第三,编辑活动的范围大大的扩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编辑劳动的对象唯有书籍,编辑活动只是“收集资

料，整理成书”。到了近代，报纸、杂志先后从书籍中分离出来，并与书籍组成范围更大的新闻出版事业。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本世纪内先后出现了电影、电视、广播、音像制品等新兴的电子媒介。编辑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早已突破了图书出版的范围。把编辑的概念，仍停留在图书编辑的范畴，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编辑活动的社会实践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编辑的概念也在不断地深化和完善。近几年来，不少学者从社会学、文化学、传播学等不同的视角对“编辑”这一主题作了理论的探索。如李荣生认为：“凡是根据社会文化效果或社会成员精神消费的需要，组织或促进精神产品的生产，并将作为精神产品的著作物转化为出版物，以及根据同样的原则对已有出版物进行重新搜集整理加工编纂，进而促使这些出版物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切活动，都是编辑活动。”^①

梁根儒、李少先等认为，编辑活动是“根据社会文化传播、积累和广大读者消费的需要，以物态化的出版物生产为目的，从事选题设计、对初级精神产品的著作进行选择、加工、整理、编纂的一种创造性劳动。”^②

王振铎认为，“编辑把人类个别的、分散的、独特的精神创造物，如原始文献、档案材料、著作手稿等各种符号记载系统，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有目的地加以审理组织，分类编排，缔结构造成为整体的、社会通行的文化知识传播物。具体地设计、组织、审读、编辑各种典事文籍、书报杂志以及声像作品等精神文化工程的活动，都称为编辑活动。”^③

① 李荣生：《编辑学绪说》，见《编辑学论集》等74页，中国书籍出版社。

② 梁根儒、李少先等：《编辑工作基础》第3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③ 王振铎、司锡明：《编辑学通论》第16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关于编辑的定义的讨论仍没有结束，应该说这场讨论对编辑学的研究不无益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真理总会越辩越明。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中也有一种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的倾向，似乎定义越抽象、越复杂越好。陷入了无谓的“概念之争”。为任何概念下定义，既要求准确地反映其内涵和外延，又要求语言简洁明瞭。对编辑概念下定义也应如此。基于这种认识，本人同意《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中对编辑所下的定义：“编辑通常是指编辑工作而言。它是对人类的社会精神产品（包括图书报刊、广播电视、声像制品等）的原稿进行选择加工，使之广为传播的工作。”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基本上反映了编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二 关于编辑“有学”、“无学”

编辑“有学”、“无学”，同样是一个引起人们长时间争论的问题。争论双方各持己见。编辑“有学”论者认为，在人类漫长的社会文化建设中，编辑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这几千年编辑活动的实践，既创造了浩若烟海的文化产品，也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今天在系统地总结这些编辑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丰富和发展，通过理论的概括便可上升为一门科学。与编辑学相近的学科中，国内先后产生过校学、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国外也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其理论和方法许多都与编辑活动有关，因此编辑有学应该是题中之义。编辑“无学”论者认为，编辑工作无非是修改整理稿件，对别人的作品进行加工，充其量不过是一门实际应用技术。古人有“述而不作”，就是说只要在原作的基础上加以编述就够了，这里面能有什么学问呢？如果说编辑有学，那学问也不是编辑的学问，而是编辑劳动的对象——著作本身的学问。

有学，无学？孰是，孰非？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仍需从实际

出发；而不能凭表面现象和主观的经验去推断。

所谓“学问”，无非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对各种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编辑学便是人们在编辑实践中对编活动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编辑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自产生以来，人们就在不断地探索其本质和规律，并认真地加以总结。孔子的“述而不作”，不但不能用来证明编辑“无学”，恰恰相反，它正是古人对编辑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早的总结。“述而不作”的本意是说，编辑古代典籍，如礼、乐、诗、书等等，要忠实地遵循先贤圣王的原作原制，不要随意改变，《礼记》曾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不作，就是说无天子之位“不敢作礼乐”，只可编述之。怎么编述呢？孔子在强调尊重原著原稿的基础上，提出“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审选原则，以使他编纂的《六经》达到“《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通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编辑思想。孔子在对三代文献的整理、编辑和删订过程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正是对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探索。其实，历代学者都曾从不同角度对编辑活动进行过专门研究，并留下了许多研究的成果。中国最早的编辑学著作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所著的《别录》和《七略》；唐代史学家刘知已的《史通》不仅是一部史书，同时也是一部编辑学著作；宋郑樵的《校略》、清代章学诚的《校通义》等都涉及到编辑学的基本理论。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编辑学”这一说法，但编纂之学，撰述之学，传注之学，校之学，目录之学，版本之学，都是专门研究编辑活动的产物。正是有这些在实践中不断形成的编辑理论作指导，才有可能产生一部部灿烂的文化历史长卷。

今天，编辑活动已经是大规模的社会文化事业了。编辑活跃在图书出版、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所有的大众传播领域里，担负着社会文化生产的设计者和组织者的任务，在整个社会

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断丰富的编辑实践为编辑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① 理论研究离不开实践，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和源泉。从人类编辑活动的实践中，总结系统的带规律性的东西，再概括和抽象出一定的理论思想和原则方法，这就产生出编辑学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讲，编辑是“有学”的，而且大有学问。

说编辑“有学”，这是从理论上讲的，从目前编辑理论研究的现状看，编辑还确实“无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和概念系统，必须有明确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编辑理论研究的现状还远没有达到这个阶段。有的同志认为编辑学仍处在“潜科学”的阶段。所谓潜科学是指一门科学尚处于孕育状态和不确定阶段，也就是一种尚未得到严格证实和科学界公认的科学思想。这个评判是有道理的。为什么编辑理论滞后于编辑实践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人类在几千年的编辑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但是由于旧时代的编辑工作社会化程度很低，长期处于自发的、盲目的、分散的状态，编辑还不是一门独立的社会职业。古代的编辑家，大多数是身兼数职，如孔子首先是政治家、教育家，然后才是编辑家，司马迁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编辑家，编辑活动往往与个人的爱好和志趣有关。虽然他们的编辑劳动为后人留下了煌煌巨著，但他们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对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的总结，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古人对编辑理论的研究成果都分散在文献学、目录学、校学等学科中，

① 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8页。

然而与这些有同样悠久历史的学科相比，编辑学却显得十分苍白。从现实的角度看，虽然编辑活动已上升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事业，编辑工作也发展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性行业，并形成一支宏大的编辑队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编辑学的理论建设并没有提到相应的地位。在一些编辑出版单位里，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编辑实践提出的许多问题急待作出理论的解答，编辑工作的实际需要理论去指导；另一方面，人们却轻视编辑理论，认为理论可有可无，更不愿意去作艰苦繁累的研究工作。大多数编辑出版机构对编辑人员的培训仍然保留着“师傅带徒弟”的原始方式，而大学里经过系统的专业理论学习的毕业生反而不被引起重视。这种状况，不可能不成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障碍。

要重视编辑学的理论研究，必须澄清认识上的一个误区：编辑不过是在别人的作品上修修改改，本身并没有什么学问。持这种认识最主要是因为不了解编辑工作的特性。编辑劳动同其它精神劳动相比较，有两个明显不同的特性：技术性和隐匿性。技术性表现在编辑劳动是一种应用性很强的工作，从整理、加工稿件到版面设计安排，无不表现为一种实用技术。既然是实用技术，“术”而无“学”，有一套“实用技术指南”就够了，还需要什么理论呢？一些编辑也常常以“改稿匠”自嘲，把自己长期隐没在琐细的实际事务之中。隐匿性则表现在编辑的劳动是以他人的作品为对象的，编辑劳动的本身不可能与读者或者观众、听众直接见面，而是隐含在作者的作品之中，这样，编辑劳动的成果就很可能被作者和作品所表现的成果所淹没，编辑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名英雄”，哪还有自己的理论呢？正是这种认识的误区，助长了轻视编辑理论的风气，也使编辑学这门学科长期提不到应有的科学地位。

由此可见，编辑“有学”、“无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编辑学研究在我国，自从1985年前后正式提出来

以后，发展势头很好，八、九年间，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千篇论文，出版了好几十本学术专著，并形成了一支由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组成的编辑学理论研究队伍。这些从事研究的同志不计名利，不为艰难，含辛茹苦，协同作战，做了大量基础性的工作。许多基本概念在讨论中逐步形成共识，作为理论构架的雏形已经显现。当然，编辑学的研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宏观上，八、九年间编辑学研究经历了几次“冷”“热”，去年以来，受各方面的影响，似乎又有“冷”的趋势（可以根据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及出版的专著的数量来分析）。从微观上，编辑学研究也有不少经验教训可总结。有的研究一开始便急急忙忙去设计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动辄一个“体系”，而不愿扎扎实实从基础开始，做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有的研究大而无边，脱离实际，陷入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泛议论，最后搞得自己也失去了兴趣。不过，这些前进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阻碍编辑学研究一步一步走向深入。理由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得更加深入，编辑实践中有越来越多的经验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给以理论的回答；一大批新走上编辑岗位的人员，需要经过系统的培训，提高编辑理论和编辑业务水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编辑事业的发展更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这些都是促进编辑学研究不断深化和提高的动力。另外，每一门学科的建立，都必然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渐进的过程。与编辑学相邻近的如新闻学、传播学产生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历史，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至今没有结论。也不能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编辑学研究在提出不到十年的时间，能够取得那么多成就，是十分可喜的。可以相信，经过编辑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门新兴的学科——编辑学必将独立于学科之林。到那时候，有关编辑“有学”、“无学”的争论自然会成为历史的陈迹。